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從《基本法》本質看政改的「結」

梁美芬 立法會議員

■梁美芬

近日，從外傭居港權案到特首的普選方案，《基本法》被重新推到了風口浪尖，相關條文再次被炒到火熱。這些爭議，因為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討論方案，令問題看似是新的，但其實，在一直參與《基本法》起草、從事《基本法》研究的人看來，這些爭議沒有一個是新的。其中原委就要從《基本法》的本質說起了。

《基本法》到底是什麼？

《基本法》好比一個混血兒，是普通法與中國法兩個法律體系的混合體。兩種法律傳統在融合過程中產生的衝突，在《基本法》適用的十幾年間亦逐步顯現；尤其是一系列居留權案所引發的關於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釋法權的爭議，已被一些人士炒作成內地干預香港司法獨立的信號。《基本法》中涉及中國法的部分也都因此變得十分敏感，從而出現了政治問題法律化，法律問題政治化的局面。看看之前包致金大法官與梁愛詩女士對過往案件作出的評論，再翻翻1985-1990年《基本法》起草時的會議紀錄，就會發現今天對《基本法》的爭論與20多年前港方與內地起草委員對《基本法》草案的爭執如出一轍。梁愛詩女士提出用人大釋法是解決「雙非」問題的最佳辦法，包致金法官則擔憂釋法會對香港的司法獨立產生長遠的不利影響。造成意見分歧的根本原因，就是《基本法》本身兼具普通法與中國法的雙重性質而凸顯了兩地法律制度的差異，兩個法律傳統在妥協與合作中產生爭議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並非政治上對「一國兩制」的淡化或者撕裂。

無論是「一國兩制」的提出還是《基本法》的制定，中方對「一個國家」這一主權原則的堅持從未動搖過。由於近代中國近300年的半殖民歷史，長久的反侵略戰爭雖最終取得了勝利，但國家早已是千瘡百孔，這也就使得歷屆的中國領導人在主權與領土問題上都有着異常堅定的立場。

《中英聯合聲明》公佈後不久，中央政府就在《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中指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中國行政區劃中的地位：「特別行政區是中央統一領導下的地方行政區。他們不是成員國。特別行政區與中央政權之間的關係是地方和中央的關係。他們必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指定的法律所規定的權限內行使他們的權利。」《基本法》第一條也開宗明義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基本法》在中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基本法》作為具體落實「一國兩制」的最高級別的法律文件，其位階僅次於中國憲法。儘管很多香港人認為《基本法》是普通法，但從《基本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而非當時的香港立法局通過，就可以說明《基本法》是屬於中國全國性法律的一種。而《基本法》的制定過程相比其他全國性法律則更加複雜和謹慎。先由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法律專家組成專門的起草委員會，又分別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展開廣泛的意見徵求過程，歷時5年的時間，《基本法》終於於1990年在全國人大得以通過。其立法過程規模之大，獲得之重視，是史無前例的。這也是「高度自治」及「維持現狀」原則最終在《基本法》中得到明文體現的原因。

日圓貶值的迷思

周全浩 資深評論員

■周全浩

過去數月，日圓迅速貶值，短期內貶值3成。日圓匯率急跌，由78日圓兌1美元下跌至102日圓兌1美元，舉世譁然！各大傳媒都密切關注日圓走勢。日圓急跌現象，有幾點值得評述。

第一，西方大國經常抨擊中國操縱匯率，對日圓迅速貶值卻視而不見。日圓貶值，當中是否涉及人為操縱匯率，大家心知肚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日本央行聯手，實施超量寬政策，不斷買債「放水」，把日圓推低，令日圓大幅貶值3成。對此，韓國已看不過眼，而西方國家卻置諸不理，毫不譴責。

第二，匯率涉及人為操縱，內幕人士想必獲利豐厚。從投資者角度看，任何一個有頭腦的投資者都應該明白，假若匯率由政府操縱，於數月間急挫3成，有份參與決策的內幕人士，必能賺到盆滿缽滿。日圓這段時間的貶值，明顯有政府參與和西方大國默許。內幕人士利用這些消息，在外匯市場大撈一筆，亦不足為奇。如真有其事，賺取的金額相信以百億美元計，乃名副其實的財富大轉移。

第三，日圓貶值3成，卻未導致通脹，情況奇怪。日本的能源和原材料如石油、天然氣、木材及其他礦物都依賴進口，食物亦有不少是進口。日圓大幅貶值，理應出現通脹，但日本國內出售的貨品價格卻沒有提高。除非廠商、批發和零售商完全承擔了日圓貶值所增加的額外成本，沒轉嫁予消費者，才會沒有通脹。日本新央行行長實施無限量寬政策，以通脹達2%為目標。日圓大幅貶值三成，進口原材料成本大大增加，貨品價格卻一個仙也不加，沒有導致通脹，情況完全違背經濟學常識，令人摸不着頭腦。

第四，對於日圓貶值，理應叫苦連天的「銀髮族」未見不滿。日本很大部分財富控制在「銀髮族」手中，他們都是「食息」一族。現在日圓不斷貶值，債券息口比以往更低，加上潛在的通脹壓力，「食息」一族卻未有訴諸不滿，令人費解。當然，這班「食息」一族可以模仿「渡邊太太」，把日圓調到高息貨幣。將日圓調到其他高息貨幣如紐元和澳元，除了可獲取更高利息收入，只要日圓持續貶值，在需要時，可以較低的匯率兌換更多日圓。但一旦日圓升值，將苦不堪言，因為高息貨幣的利息收入，可能難以填補因匯率上升所導致的虧損。

雖然傳媒報道指日本民眾普遍偏好作高息貨幣存款，但就筆者曾接觸的一些日本教授卻指出，因為他們考慮到把日圓調回時，需要承受匯率風險，因此不敢輕率從事。往外套息，是否如傳媒所渲染般普遍，值得思量。

「佔中」衝擊法治 難掩暴力本質

馬 彥

「佔領中環」的實質就是要「癱瘓中環」，這是「佔中」發起人不能迴避的後果；「佔領」、「癱瘓」離不開「違法」和「暴力」，這也是「佔中」發起人始終無法交代的問題。「佔中」被社會斷定為違法行動，因為它要顛覆法治社會的核心價值，但是在暴力背後，戴耀廷等「佔中」發起人卻不斷以「愛與和平」向港人洗腦，將「佔中」行動柔化，成為毒藥外的糖衣，令部分港人誤信「佔中和平」，誤信「佔中」可以令香港普選全面發展，麻痺危機意識。這是一切政治異端的危險之處，港人必須破除這些「和平佔中說」的偽善，認清「佔中」衝擊法治的實質，香港才能避過一場暴風雨，普選才能在陽光下向前邁進。

今年1月，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在報章撰文闡述「佔中」理念，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行動的危害性。面對公眾責難，戴耀廷並沒有偃旗息鼓的打算，反而在3月進一步和另外2名「佔中」發起人朱耀明、陳健民共同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把「佔中」美化為一場爭取普選的「正義抗爭」。其實，「佔中」發起人清楚知道為甚麼要「佔領中環」，因為「佔領中環」才有脅逼政府就範的效果，這離不開暴力違法、破壞公共秩序等手段，但難以獲取公眾認同，他們最後只能以「愛與和平」包裝掩飾，甚至搬弄「公民教育」為「佔中」張冠李戴，這反映出「佔中」分子既要抗爭又不敢正視暴力後果的鴕鳥心理。

既要「癱瘓」何來「和平」

「佔中」是反社會行動，是把香港激進分子匯聚起來的激烈抗爭，它不可能不引起暴力問題。戴耀廷在4月再撰文揚言「佔中」要收到「核爆效果」，要市民從「佔中」行動後繼續進行各種不合作運動，「那才會真正令香港癱瘓，而不只是癱瘓中環，令香港成為一個難以管治的地方」。「和平」和「癱瘓」是自相矛盾的概念，「佔中」發起人既要市民「和平參與」又希望達致「癱中」目的，這種混淆視聽的說法缺乏邏輯推理，但這能為「佔中」分子找到藉口逃避暴力現實，迴避向社會交代「癱中」的責任。

用「愛與和平」粉飾違法暴力的「佔中」行動，這又反映出「佔中」發起人誤導公眾、不肯承擔行動後果的心態。「佔中」從一開始就與違法和暴力結合，這是港人必須清楚了解的性質，參與者無可避免會被捲入暴力的政治漩渦中，青少年有可能因參與「佔中」被警方拘捕自毀前途，孩子會因暴力事件無辜受傷。然而，「佔中」發起人還以「愛與和平」將行動美化，標榜行動是「和平集會」，甚至時刻強調「中環淪陷」並非他們的目的，誤導公眾以為「佔中」的確是「愛與和平」，的確可以爭取普選，結果卻令參與者誤墮法網，誤信香港可以藉「佔中」達致普選，麻痺港人認清「佔中就是違法和暴力」的事實。實際上，「佔中」發起人的普選訴求不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佔中」不可能令香港民主普選向前發展，暴力行動更不可能令港人就範；戴耀廷等還信誓旦旦以此吸引港人參與，最終只會令更多港人步入違法深淵，香港營商環境被破壞，後果卻由港人承擔，反映出「佔中」發起人口蜜腹劍、不負責任的態度。

中環癱瘓 誰人負責？

在輿論壓力下，近日在其行動網頁上說明，參與者須簽訂誓約，其中包括一條自動脫離條款，簽署者須承諾一旦在行動中使用暴力，將自動脫離行動，以確保參與者有自願退出的途徑。「佔中」破壞公眾秩序，中環陷入癱瘓狀態，參與者屆時身處其境，躲也躲不了，簽署所謂誓約不能保證暴力行為不會發生，暴力分子不會因此便和「佔中」劃清界線，「佔中」更不會因此變得和平。在暴力的行動中尋求「和平」只能是緣木求魚，因為裡面沒有和平的元素，巧立名目只能擾亂視線，社會須高度警惕。「佔中」發起人仍須向公眾交代「佔中」後果，向社會負責，不能輕率帶過。

美國主宰世界已成「過去式」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二戰後，美國依仗經濟、軍事優勢，充當世界警察，扮演超級大國角色，通過各種方式干擾所有國家政權，幹盡損人利己的勾當。隨着獨霸世界思維的高度膨脹，隨意對全球國家指手劃腳、說三道四，甚至赤裸裸軍事介入，把地球村搞得很不安寧。然而，由於看不到自身的制度弊端，連續透支，終於引發金融瘟疫。由於債務猛增、經濟下滑、失業率高企、市民對政府強烈不滿，華盛頓已經對自己的諸多慾望感到力不從心。不僅急於想從阿富汗撤軍，甚至希望塔利班「高抬貴手」，坐下來和美軍談判，共建「民主」，顯示美國主宰世界已經成為「過去式」。

據西方媒體披露，美軍一手「導演」建立的阿富汗政權，不僅沒有民主、繁榮，反而成為世界上最腐敗的政權。萬般無奈之下，美軍不得不寄望與昔日對手塔利班「和解」，希望通過「談判」方式「握手言和」，然後「體面」離開阿富汗。和塔利班「和談」是奧巴馬不得不做出的恥辱決定，實在是萬不得已而為之。隨着美軍從阿富汗撤軍日期的臨近，美國與塔利班之間的「互動」更加緊鑼密鼓。美國要求塔利班放棄武力、承認阿富汗政府、尊重憲法、斷絕與「基地」組織的所有關係。所有這些均證明：美軍和塔利班的較量已經分出勝負。

「重返亞太」已經變成空話

大多數人相信，美軍和塔利班「談判」的如意算盤很難成功。美軍尚未撤離，塔利班公開宣佈進行「春季攻勢」，阿富汗緊接着將面臨更加殘酷的戰爭。奧巴馬一方面急於從阿富汗撤軍，一方面又將「重返亞太」喊得震天響，但由於經濟復甦無力，政黨互不買賬，「重返亞太」又需要更多燈油火蠟，沒錢支持，「重返」就變成空話。白宮現在根本拿不出資金來支撐口號，實施大計。包括印度、澳大利亞和東盟等都看透華盛頓，只是表面和白宮打哈哈。不僅亞太國家不看好美國重返亞太，歐盟等西方國家同樣不看好美國重返亞太，認為「重返亞太」是在忽悠西方世界。

據美國《防務新聞》報道，英國議員近期呼籲唐寧街慎重考慮是否應該繼續與美國保持「緊密跟隨」關係。澳大利亞媒體亦披露，美國將在澳獲准使用的訓練場，高調聲稱為軍事基地，顯示華盛頓別有用心。澳大利亞前總理公開抨擊美國，高估自己實力「重返亞太」，看不到自己的經濟災難，到頭來會頭破血流。東盟國家認識到，中國連續幾年是東盟的最大貿易夥伴，已經成為影響東盟國家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元素。事實上，美國內部的校園槍擊案，財政危機，白宮能夠做的也只是口水戰，已經完全應付不了自己的迫切問題。

吸引人才能力顯著降低

據《紐約時報》披露，大部分美國大學目前財政困難，吸引優秀人才的能力顯著降低。一個國家缺少吸引人才的能力，在全世界強力推行「美式民主」的企圖也必然成為笑話。上世紀，在美國加州，路不拾遺，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比例，成為加州長官最自豪的政績，當時教育投入是治安開支的兩倍。由於經濟危機，加州政府現在不得不靠變賣政府康樂設施過日。由於美國的罪犯快速增加，加州在監獄的投入已經反過來是教育開支的兩倍。「9．11」事件導致美國捲入兩場戰爭，耗費了國力、拖垮了脆弱的經濟，已經使美國、美元威風掃地。

持續的對外擴張、特別是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使美國的國內外矛盾空前加劇。龐大的軍費開支導致國債高企，讓「金元帝國」危機四伏，前景令人擔憂；美國已經陷入二戰以來的最大危機。奧巴馬2008年競選總統時，批評共和黨的軍事政策，指非萬不得已不能派軍隊出國參戰，並表示上任後會迅速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奧某還借助這些言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上任後，卻不顧失業率高居不下的現狀，又組織對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家的軍事行動，戰爭吞噬了美國經濟，昔日富庶的美國已經變成百孔千瘡。

「職業安全健康」與「公司利潤」可以兩者兼得？

葉偉明 香港工會聯合會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副主任

■葉偉明

自1990年開始，西方社會已提倡「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筆者非常歡迎香港商界舉辦更多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活動，用以表揚有良心公司，及鼓勵其他未參與的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使命。但是，在現今的香港，公司是否真正地能夠做到以上的承諾？老闆是否認真地以人本效益理念為基礎，為員工提供一個職業安全健康保障的環境？還是，老闆仍抱持成本效益理念，獲得最大的利潤？

企業表裡不一 漠視職安健

國際勞工組織已在1981年就「職業安全與健康」的項目，制訂《國際勞工公約》第155號，提出老闆須為員工提供一個安全環境，保障員工在上班期間的安全。其後，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在1997年制定出《社會責任8000》（簡稱為SA8000），成為全球首個有關道德規範的國際標準。SA8000所提出9項規定中，在第3項有關「健康與安全」的範疇，已經列明「應考慮有關行業的危險，為員工提供一個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公司須於合理可行的情況下，降低工作環境中的危險，藉此避免意外事故發生」。

由1970年代開始，不論是跨國公司，還是本地中小型公司，老闆經常抱着一種「賺得最多」、「付出最少」的心態，來營運公司。老闆擔心若果履行職業安全健康的責任，就需要投入大量金錢、時間及人力等資源。為了避免投放資源在職安健範疇上，擔心成為日後經常性支出，老闆經常借股東來「過橋」，提出如果推動職業安全健康，付出大量資源，會影響公司的利益，怎樣向股東「交代」？時至今日，老闆抱持這種心態，只顧公司盈利及股東利益，忽略員工的職業安全健康，不單會破壞公司形象，還會影響日後企業持續發展。

筆者認為現時很多企業，不論跨國企業，還是本地中小企，大都是表裡不一。表面上提倡社會責任實踐的精神，拿取「商界展關懷」品牌；實際上向員工「講一套、做一套」，剝削員工的血汗錢。近日，一間美資大型電梯公司，在2003年「沙士」期間，公司要求員工減薪、削減福利，要求員工與公司一起共渡時艱，員工全力支持公司政策。但是，到了公司賺大錢的時候，公司不單沒有回復到「沙士」期間薪酬、福利的調整，公司更不斷用盡辦法，剝削前線員工應有權益及福利；剛剛有一名工友，因多日做近15小時，身體過度負荷勞累致死，這樣的公司，是真正考慮到員工的職業安全嗎？

精神健康欠佳 員工流失大

有公司老闆打算把投放到職業安全的資源，捐助給慈善機構，以博取社會對他們的認同，這簡直是沽名釣譽！老闆明知公司出現了職業安全風險，但仍坐視不理，不單導致員工受傷，同時亦將員工受傷後所造成的負擔，轉嫁予社會，社會須提供包括職業復康、情緒支援等服務，最終結果都是由納稅人負責，甚至由我們下一代來承擔這個包袱。

筆者批評有部分從事服務性行業的公司，涉及銀行、電訊、保險等行業，經常以利潤為首要目標，為員工訂立不合理營業額，漠視員工的精神健康狀況，對員工造成沉重的工作壓力。員工沒有太多時間陪伴家人，出現了聚少離多問題；而公司所訂立無理的營業額，迫使員工就範，否則就要他們「自動消失」，這種做法，亦令公司流失員工，公司需要付出額外資源，重新培訓新人，增加了營運成本，因而減少利潤。

最後，筆者強烈要求，各大小公司需要履行社會責任，在推行職業安全健康政策時，要以人本效益為依據，改變目前公司傳統成本效益觀念，要視員工為公司最大的資產，老闆要多加關心員工的精神健康狀況，給予正面的鼓勵，事事照顧員工的需要，從而增加員工對公司的歸屬感，這樣就可以提高員工對公司的正面效能。同時，公司除可因此贏取員工的信任之外，亦可以吸引更多有才華的人士加入公司，大大提升生產力，從而幫助公司賺取更大利潤。另外，筆者希望政府在推動職業安全健康議題上，扮演一個「主導」角色，利用稅務寬減的手法，鼓勵公司投入資源在職業安全健康措施上，從而達到員工、公司及政府受益的「三贏」局面。